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一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藏书史话

王丹学 李经 著



山西藏书事业的发展是随着社会日益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山西藏书具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涌现出许多极富个性和影响力的藏书家。在推动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上，山西藏书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李秋芳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 11 辑)

山西藏书史话

王开学 李红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1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36—3

G·13 定价:(全套 10 册)30.00 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精彩的开篇	(3)
二、稳健的脚步	(5)
三、对峙中的发展	(12)
四、大一统的辉煌	(23)
五、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37)
结 语	(49)

引 子

从逻辑上来说,有了书籍,应该就有了藏书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藏书,大致可分为公藏与私藏两部分,另外还有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公藏也称官藏,东周“藏室”,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官藏机构。私藏即私家藏书,它要晚于官藏,孔子即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寺观藏书主要是指寺院和道观藏书,它起源于东汉末年,那时的洛阳白马寺等寺院已有藏书形态出现,并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藏书。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中最后形成的一个藏书系统,它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在促进、繁荣古代文化教育活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山西由于地处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一条母亲河又由北而南、从东向西将全境环抱其中,悠久灿烂的大河文明哺育出了优秀灿烂的三晋文化,使这片黄土地,自古以来就文化昌明,经济发达。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曾经引领了一个时代,山西藏书的历史正发源于此时。它与中国藏书史几乎并驾齐驱,在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山西都当仁不让地走在前头,这正是山西古老文明的一个佐证。

中国最早的官府藏书起源于周之“藏室”,山西最早的官府藏书则是“司晋之典籍”,同在春秋时代,难定先后,平分秋色;中国最早的寺观藏书发端于东汉末年的洛阳白马寺,而山西五台山在东汉永平十一年即建成了大孚灵鹫寺,

而通常在寺院里都建有藏经阁,因此山西的寺院藏书也应该是很早的;中国最早的书院藏书是唐初的丽正、集贤(官办)及李公书院(民办),而山西最早的书院据记载则是立于永济五老峰下的费君书院(民办),它也建于唐代;至于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当然是孔子了;稍后的赵国人荀子,也是著名的典籍分类专家,他曾生活在山西古绛州一带。

总之,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山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进入近现代,山西也并不逊色多少。戊戌变法后,在旧式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转轨过程中,全国最早建立的三所大学堂中,其中之一就是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的藏书楼与藏书在当时的中国都是比较可观的。宣统元年建立的山西公立图书馆,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至于寺院藏书,山西一直非常耀眼,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也动人心魄。民国时期的私家藏书山西也非常活跃,为山西的旧式藏书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开始,中国乃至山西的藏书事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重藏轻用终于被藏以致用所代替,藏书为社会、为经济、为人类服务的价值和作用被越来越充分地挖掘出来,“秘不示人”的时代结束了,“与众共之”成为藏书真正的主题。

一、精彩的开篇

叔虞封唐，揭开了宏大晋国的帷幕，也开启了山西历史辉煌的篇章。强大的晋国，孕育出了强健、优秀的三晋文化，山西悠久的藏书传统也在此时生成并逐步走向成熟。

（一）从“数典忘祖”说起

成语“数典忘祖”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算陌生，但其背后的故事、故事中所关涉的中国藏书史上的重要信息，估计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然不管知道的人多少与否，它都是研究中国藏书史的人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春秋时，晋国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责问晋国为什么没拿宝器贡献王室？籍谈回答说是因为晋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周王室的赏赐，所以无器物可献。周王不以为然，指出从晋的始祖唐叔虞起，晋国就不断受到周王室的赏赐，而籍谈身为晋国司典（掌典籍的官）的后代，竟不知这些史实。接着，周景王问籍谈为什么姓籍？籍谈答不上来。景王告诉他，因为他的九世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司晋之典籍”，即掌管晋国的图书档案，他的后人便因官而姓籍氏。景王对籍谈说：“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为对。后来，周景王对人说：“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全部故事。故事告诉人们，春秋时的晋国已经建立了管理图书档案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籍谈九世祖、身

为晋卿大夫的孙伯黹即荣任此职。

其实，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董氏一族，《左传·昭公十五年》又载：“及辛有之二子董子，晋于乎有董氏。”这段记述是紧随籍氏之后的，说明继晋国史官孙伯黹而后，辛有之子又开始职掌典籍了，而且也仿籍氏以官为姓。和籍氏一样，“董氏”遂成为世业管理典籍文献的官职。被孔子誉为一代良史的董狐，就是董门的佼佼者。

晋国历史典籍的收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相沿有序，兴旺不衰。据《吕氏春秋》记载，晋太史屠黍因为晋出公骄狂而无德义，于是将其所保管的“阁法”（即政典等）全部交于周室。而此时已是战国初年，距籍谈九世祖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一长长的历史阶段中，看来晋国的统治阶层一直都十分注重典籍的收藏和保护。收藏的内容，大约是以史料为主的政典掌故。总之，数典忘祖的故事为山西藏书史奏响了很有意味的序曲。

（二）侯马盟书

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范围内，发掘出土了距今两千四百年前的珍贵文物——侯马盟书。何为盟书？它是我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盟誓的辞文。春秋时期，盟誓之风盛行，诸侯或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而经常举行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礼仪活动。“侯马盟书”据专家考证，大部分是晋国正卿赵鞅及其后代同有关各方订立的盟约。盟书都是一式两份，一份埋在地下，一份藏于“盟府”。侯马出土的盟书，就是当初埋在地下的。而盟府是承办盟誓的专门机构。同时也成为

“盟书”这种特殊文献的收藏机构。因为盟书是一式两份，故埋于地下的大量的侯马盟书，恰好说明在当时的侯马“盟府”也收藏有大量的“盟书”文献。而这种收藏又是有目的的，有系统的，它为研究晋国的历史，探讨当时激烈的社会变动，以及先秦的文字、礼仪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

侯马盟誓遗址出土盟书约 5000 件。文字可辨者 656 件，每件少者 10 余字，多者 200 余字。其中大多是用朱笔在玉石片上写成的，间有墨书。绝大多数为圭形，最大长 32 厘米，宽近 4 厘米，小的长 18 厘米，宽不到 2 厘米。如此大规模的“藏书”，不仅有力地印证了侯马即晋都新田的所在地，而且也为山西藏书史增添了精彩的一笔。1976 年，《侯马盟书》报告的面世，在全社会掀起了盟书研究的热潮，所主要凭借的当然是山西侯马出土的晋国盟约文书了。

二、稳健的脚步

发轫于春秋战国之季的山西藏书事业，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官府藏书外，寺院藏书、书院藏书也开始出现，尤其是随着私家藏书的日趋活跃，山西藏书呈现出了百花争妍的局面。

（一）北魏、北汉的官府藏书

汉“永嘉之乱”后，北朝社会长期动乱，“礼乐文章扫地将尽”。这时候，拓跋鲜卑崛起于塞北，并很快统一了黄河以北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结束了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天

兴元年(398),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历代统治者的文化程度都较高,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在他们向中原发展势力的过程中,就不断搜集图书。皇始二年(397)十月,道武帝拓跋珪败后燕慕容德部,“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迁都平城后,道武帝就命各郡县广泛搜寻书籍,秘阁、东观所藏经籍日渐充盈。道武帝尝问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志?”李先对曰:“莫若书籍。”帝于是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作为北魏王朝的开国之君,他的这些雅爱文化的举措,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楷模。可以想见,由于道武帝等对书籍的极端重视和身体力行,当年的大同城一定是中国北方的图书收藏中心,盛况空前。关于图书典藏情况,《水经注》记载说:“魏天兴二年,迁都于此……太和殿之东北,接紫宫寺,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堂南对白台,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录秘籍,悉职其下。”道武帝在位期间,至少有两次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搜集图书的举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国中之书籍全部集中典藏于内府。“天下书籍,凡有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他不时地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千方百计想把图书典籍搜罗完备。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班制天下,经籍稍集”。文成帝太安年间(455—459),秘书郎高谧认为当今“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文成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拓跋珪为首的北魏皇帝,不仅搜求文献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注意典藏保护,把“国之图录秘籍”置于如此华丽堂皇的建筑中,足见其重视程度。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秘库所藏,散于尔朱荣之乱。

隋唐以来，太原一直是北部中国的重镇，素有北都，北京之称。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皆据之而起。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北汉也建都太原。经过隋唐以来 300 余年的经营，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发展，太原已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大量的图书典籍在当时的北方也是首屈一指的。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灭亡。进占太原后，太宗即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以入崇文院之藏。刚灭了北汉，太宗皇帝就令官员搜集书籍，这一方面说明宋太宗对图书典籍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汉政权府库中的图书典籍数量及其可观，要不何以有此专门之举呢？当然，具体的数量我们无从得知。据《宋会要辑稿》所说，雷德源所点检者，并非是北汉一朝之图籍，而应是“五代以来之遗也”，可见是相当丰富的。

（二）日渐兴盛的私家藏书

在北魏历代皇帝的倡导下，北魏的官府藏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风气所及，私家藏书也开始活跃起来，从北魏直至五代，在山西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了李业兴、穆子容、樊逊、裴松之、张琚、李读、柳仲郢、王涯、薛稷、毋昭裔、王景纯、杨守业等数十位藏书家、刻书家和目录学家。在推动山西藏书事业的发展上，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李业兴(474—549)，上党长子(今山西长子县)人，北魏宣武帝时举孝廉，为校书郎。孝明帝时，迁奉朝请。孝庄帝时，除著作佐郎。历官散骑侍郎、国子祭酒、太原太守、中外府咨议参军等。李业兴从小就耿介志学，曾拜著名学者徐遵

明为师，博涉百家，尤长算历。孝庄帝延昌中年，他以《戊子元历》一书赢得很高声誉，赐爵长子伯。在为官为学的同时，李业兴还爱书如命，常常四处搜集，亲手补抄，“躬加题帖”，其家所藏有万卷之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业兴是北魏、北齐之际全国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之一。他的藏书不光“独善其身”，还惠及国家，北齐天保七年(556)，文宣帝诏樊逊等十二人“校定群书”，由于当时秘府所藏纰缪颇多，要刊定群籍必须广集众本，于是樊逊提议向藏书家邢子才、魏收、辛术、穆子容、李业兴等人借书，以“参校得失”。其时李业兴已故世多年，他的藏书还得以较好地保存，并为国家整理藏书和编目发挥了作用，实在难得。李业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家。

穆子容(? —551)，字山行，代(今山西大同)人，北魏时历官通直散骑常侍、平东将军、中书侍郎、汲郡太守。入齐为司农少卿。据《北史》所载，穆子容少即好学，无所不览，广求天下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在当时的书籍发展水平下，能达到万卷，应是一个极不容易的数量。由于穆子容的藏书质高量多，故在北齐天保七年整理全国藏书时，朝廷特向其借书来“参校得失”。据《北齐书》载，这次北齐朝廷为校定群书公开向全国藏书家借书者共有五人，其中就有山西二人，即穆子容和李业兴。还值得一提的是，受皇帝之命，全面负责校书事宜的樊逊(? —565)也是山西(临猗)人，而向全国藏书家借书以参校官藏正是他的主意。樊逊的这些方法比刘向当年校书无疑又进了一步，他将私家藏书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为提高对官藏图书的整理水平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从樊逊被委以此任和对全国藏书家的了解来看，樊逊应是北齐一位著名的学者、校勘家和藏书家，北魏、北齐图书事业的发展应有他的一份贡献。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刘宋时，裴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采群书一百四十余种，撰成影响深远的《三国志注》，成为一代史学大家。其实，除著名的《三国志注》外，裴松之还有一部目录索引方面的著作——《史目》。尽管该书已不存，但从佚文可知，这是抽出前代史书的纪、传、表、志篇目，加以解释介绍的篇名目录。其目的有二：一是帮助初学者了解历代史书篇目的意义和方法，指导治学；二是方便查找各史书的篇目，以节省时间。由于《史目》有较强的实用性，在唐宋得到发展，杨松珍撰的同名《史目》，殷仲茂撰的《十三代史目》，杜鎬撰的《十九代史目》等都是其效尤者。有研究者认为，裴松之的《史目》及其后继者同类著作，已经具备了初期索引的一些特征，其在目录学发展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毋昭裔，五代十国后蜀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官至后蜀宰相。为五代时期蜀中的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毋昭裔出身贫贱，但酷爱读书，宋人王明清《挥尘余话》说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他)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事实的确如此，后蜀广政年间，在毋昭裔的主持下，先是刻石《九经》，立于武都学宫，这就是有名的蜀石经。后又以木雕印《九经》，版行于世。除《九经》外，还主持刊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文学、类书方面的图书。自五代

至宋，四川始终是我国印刷业中心之一，这与毋昭裔的重视和提倡有极大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蜀毋昭裔出私财百分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句话充分肯定了毋昭裔在向社会推广、普及图书方面的功绩。近人叶昌炽在其《藏书纪事诗》里这样评价毋昭裔：“蜀本九经最先出，后来孳乳到长兴。蒲津毋氏家钱造，海内通行价倍增。”贵为宰相又酷爱刻书、印书，终开一地风气，天府之国之荣幸也。

自魏晋以来，河东地区（今山西南部）一直是文化昌明之邦，多有藏书和藏书家。唐高祖第十一子李元嘉（618—688），十五岁始主管潞州（今长治市），极好学，“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诗人司空图（837—908），隐居中条山麓（今山西永济），唐乾宁三年，陕军焚毁其图书七千四百卷。藏书家杨守业，唐末任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刺史，喜聚集书，以家藏图书供少年张宪阅读。张宪后来成为有名的藏书家，即深受杨守业之影响。韩恽（882—942），世仕太原，后晋兵部尚书，“聚书数千卷”。北汉王景纯为官潞州时，常“购四方书钞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如此等等，他们或系河东人士，或系宦游在此，但对图书事业的同样热爱和孜孜以求，为河东大地带来了长久的文化馨香。

（三）费君书院

凡是书院，必有藏书。书院最早的涵义就是藏书和修书的机构。即便后来书院逐步具有了学校性质，并以课士授徒为主，也是离不开藏书的。藏书是书院必备的条件，如果书院无书，生徒何以为读？后来的书院是具有藏书、刻书、授徒

三大功能的。在近千年的书院历史中，藏书始终是书院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唐代，山西也有一座书院——费君书院，它位于现永济市虞乡镇五老峰下，有唐人杨巨源《五老峰下费君书院》一诗为证：“解向花间栽碧松，门前不负老人峰。已将心事随身隐，认得溪云第几重。”费君书院是山西最早建立的书院，也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书院之一。按照唐代书院的性质，它应该也以收藏图书为主，那么费君书院也就开创了我省书院藏书的先河。

（四）寺院藏书

在我省现存的古籍善本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早的版本大都是佛教图书，如北宋刻《开宝藏》零本、《佛说北斗七星经》、辽刻《妙法莲花经》、金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等。这些珍贵的版本以及其它流传至今的经藏，与山西历史上寺观藏书的兴盛，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山西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东汉永平十一年，洛阳白马寺建成，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同年，山西五台山也建成了大孚灵鹫寺。魏晋以后，佛教在我国迅猛发展，寺院林立，同时在寺院里，一般都建有“藏经阁”，作为专门的藏经之所。而在山西寺院中，把经藏贮于佛塔内保存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种办法因收藏比较隐蔽，更利于藏经的保存流传。

隋唐是寺院藏书史上的一个空前繁荣期。明胡应麟说：“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隋代，并州已成为全国佛寺藏书最集中地区之一。《隋书·经籍志四》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而京师及并州、

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并州的地位从隋代起已开始日渐重要起来，这时的寺院藏书也可与都城长安平分秋色了。

唐咸亨四年(673)，唐高祖第十三子郑惠王李元懿赐长子法兴寺舍利子三十七粒，及写本大藏经三千卷，法兴寺遂建舍利塔贮之。三千卷，在写本时代，一次赐赠如此多的经卷，应是一个不菲的数字。这似乎也是山西境内佛寺藏书最早的一个有确切记载的数字。武则天时，五台山显通寺因收藏新译出的《华严经》而改名为大华严寺。至于五台山金阁寺，更是唐时全国四个有名的藏书寺院之一(其它三个是：京师大慈恩寺、京师西明寺、庐山东林寺)。金阁寺建于唐大历二年(767)，据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载，开成五年(840)时，金阁寺普贤道场中经藏阁藏有大历十四年开始缮写的金银字大藏经及画幅。圆仁记载到：“下阁到普贤道场，见经藏阁大藏经六千余卷。”五台山在唐时又称清凉山，《宋高僧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无业法师游历清凉山，曾“于金阁寺读大藏经”。这些材料证明金阁寺在此时期是博富藏经的。

总之，在北朝尤其是隋唐时期，山西的寺院藏书是非常发达的，在全国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对峙中的发展

宋辽夏金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也是

宋王朝与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建立的辽、西夏、金、元王朝先后对峙、最终由元帝国统一的时期。山西由于地处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冲突与交融地带,加之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形势,因此在民族分裂时期,山西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这一时期,山西平阳一带已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图书事业也在分裂中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 平阳——北方的书籍中心

宋代重文轻武,文化昌明。光绪《山西通志》称:“宋置书库于太原”。根据是宋大中祥符年间,太原建寿宁寺,寺内有碑曰《宋太宗书库碑》。旧志说,是碑为建寺作,现碑已不存。但清代学者朱彝尊有《宋太宗寿宁寺书库碑跋》一文,文中说:“右宋太宗皇帝书库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书,勒石在太原府寿宁教寺。有太宗御制文集四十卷、又集十一卷、怡怀诗一卷、廻文诗一卷、逍遥咏一卷、至理存怀篇一卷。宋志载御制集一百二十卷,盖统言之也。”看来这个书库主要是以收藏宋太宗的御制文集为主。但似乎也应包括宋太宗灭掉北汉后,命左赞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北汉官府收藏的五代以来的大量图书典籍。

尽管有“宋置书库太原”之举,但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金元时期,山西乃至北方真正的文化中心是在平阳。平阳是金时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集中了众多的书坊,如平水书籍王文郁、平阳姬家等。毫无疑问,这些书坊除刻印了大量书籍外,也藏有许多名贵的版本和深受时人喜爱的普通书籍,如《大观本草》《地理新书》《春秋纂例》等。平阳印刷业的